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理论前沿

真知灼见

西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

□ 周志宏

传统治理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内聚性历史演进,共筑“中国”版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西夏的兴衰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与变革,有效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植根于中原王朝正统版图之内。据《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酋长细封步赖举部内附,太宗降玺书慰抚之”;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赐姓李氏”,正式将党项首领纳入唐朝宗室体系。至五代时期,《资治通鉴》记载后唐明宗长兴四年(933年),党项首领已“据有银、夏、绥、宥四州”。这表明,党项族是在唐朝的支持下发展壮大,逐步在西北地区形成了稳固的势力范围。历经五代十国的风云变幻,党项族不断积蓄力量,最终在“中国”版图之内形成地方区域政权。

形成多民族政权并立的政治格局。《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庆历二年(1042年)好水川之战后,宋朝通过“岁赐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等方式维持和平、促进交流。西夏与宋、辽、金时战时和,但“战”与“和”都是在“天下一体”的前提下展开的内聚性活动,“战”是谋求地位与利益的统一之战,“和”是“兄弟”“君臣”“甥舅”之间的智慧妥协。这种特殊的互动关系,为党项与北方、中原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北方与中原地区的逐步内聚融合。

推动了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宋夏之间的战争与和平是西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规模战争到庆历和议,再到持续的边境冲突、频繁的政治军事互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蒙古灭夏过程中,《元史》特别记载了西夏人高智耀“请免儒户徭役”的事迹,表明其政治精英在融入中原事务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黑水城出土文献显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繁荣了西夏的经济,而西夏也保护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有力地促进了西北经济一体化,为元朝重建大一统格局,尤其实现对青藏高原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版图基础。

汉文化深刻影响,融聚“中国”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西夏文化广泛吸收多民族文化养分,各具特色的文学艺术相互借鉴,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夏文字是汉字文明创新活力的生动

体现。西夏王朝建立前,党项有语言而无文字,在与中原人长期交往后,受儒家文化熏陶,借鉴汉字创制西夏文,这是西夏历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宋史·夏国传》记载,“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西夏文字采用“偏旁部首+表音音节”等构字方式,既保持汉字结构规律,又对“六书”造字法有所突破,体现汉字文明的创新活力。西夏文字的推广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以西夏文化繁荣发展,催生了大量西夏文献的编纂和西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独特瑰宝。

以儒治国是西夏尊崇中华文化的具体实践。儒家文化是西夏政治文化的主流。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规定,“蕃汉人学者,当以《孝经》《论语》为课试之本”。西夏在各州县广设学校,兴建孔庙,设立蕃学、汉学二院,大量翻译儒家经典,推行蕃汉均可参与的科举制度,构建了以“汉学”为主体的官学教育体系,营造了浓厚的尊孔崇儒风尚。特别是西夏陵出土的残碑显示西夏统治者追封孔子为“文宣帝”,其尊号较唐宋的“文宣王”更进一级,加之《金史·西夏传》中记载“尊孔子为帝,设科取士,以经义为先”,都反映了西夏对儒学的推崇和对汉文化的吸收。

艺术互鉴是西夏多元文化互通的鲜明印证。党项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族群,音乐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清人在《西夏书事》中讲道,“其礼文仪节、律度声音,无不遵依宋制”。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乐舞图》中,箏、琵琶等中原乐器与党项羌笛和谐并存,都有力地说明了中原乐律对西夏音乐发展的影响。五个窟石窟第1窟壁画《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像》,不仅在风格样式上继承了唐宋以来壁画的视觉传统,还吸收融汇了宋夏时期不同媒体艺术元素。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宫廷诗集》,风格不同于西夏传统诗歌,每句字数、用韵规则等都与中原同类作品相似,显然深受汉文化影响。这些艺术成就,既是西夏文化独特魅力的绽放,也为中华艺术宝库增添了璀璨光彩。

各民族互动共生,增进“中国”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民族之所以团结融合,多元之所以聚为一体,源自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源自中华民族追求团结统一的内生动力。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和吸纳力,才可久可大、根深叶茂。西夏建立后,党项、汉、吐蕃、回鹘等多族群在同一块土地上和睦相处、和谐共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实践。

西夏构建“共同家园”强化身份认同。《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

也”。西夏统治者将祖先追溯到北魏拓跋氏,《魏书·序纪》明确记载北魏拓跋氏为黄帝后裔,“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进而建立起西夏人是炎黄子孙的历史叙事。《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王朝建立后曾上书宋朝自称“臣祖宗本出自帝,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党项作为羌的分支,《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从族源上印证了其与中华民族同源共祖的脉络。

党项内迁极大地促进了族群交融。北朝时党项居于西海郡(今青海海晏县西),过着原始游牧生活。《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其“不稼穡,土无五谷”。唐朝初期,党项族受到吐蕃的影响,请求内迁。《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其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等州以处之”。这是党项的首次内迁。安史之乱后,唐朝又将庆州党项迁往银州以北、夏州以东之地。党项内迁定居后,积极适应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其他族群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元史·氏族表》记载,西夏覆亡后,党项人“或归汉,或入蒙”,逐渐融入其他族群,助力了元朝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经济互济为民族内聚提供了动力。西夏时期,党项以畜牧业和农业为主,汉族则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具有优势,吐蕃和回鹘在畜牧业和贸易方面有独特贡献,各族群共同生活,相互依存。《马可·波罗游记》对西夏故地多民族共居、贸易繁荣的景象有过描述。各族群通过榷场互市等频繁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紧密了彼此联系,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西夏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原体制的承袭与创新,在历史进程中与中原及周边政权的互动融合,在文化上对儒家思想及多元艺术的深度吸收与创新,在族群构成上的多民族共居与深度交融,无不深刻印证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必然性与强大生命力,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五个共同”的生动实践。西夏陵作为西夏时期留存至今规模最大的、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考古遗存,是多族群融合与多元文化交流的结晶,严谨的选址方位、宏大的空间布局、承袭唐宋又具创新的陵寝制度、独特的建筑风格、精湛的建造技术、融合蕃汉的丧葬习俗,以及出土的丰富文物遗存,不仅承载着厚重的西夏历史文化,更为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格局,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直观物证。

(作者单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准确把握三个“更加”的科学方法

宁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等重要要求。这三个“更加”的最新判断和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进一步继承、丰富和发展,是指导全面从严治党根本理论遵循和实际行动指南。在新征程上,我们要以三个“更加”为科学指引,以坚韧执着、必胜信心和坚强决心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坚强保障。

形成一个有机统一、相互联系的整体

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更加有效管党治党,才能更加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科学方法,三个“更加”彰显了我们党在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方面一以贯之的政治自觉和战略清醒,表明了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主动和行动自觉,具有极强的宏观性、战略性、科学性以及针对性。

三个“更加”集中体现了整体推进与系统提升、宏观谋划与重点突破、近期部署和长远规划、问题导向与结果导向的有机统一;既是相辅相成、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又是紧密联系、内在贯通、各有侧重的,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从总体来看,三个“更加”从根本前提、有力保障和务实举措等三个维度,进一步明晰了全面从严治党科学方法、新路径。具体而言,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根本前提,因为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我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纲,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长远和全局。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有有力保障,因为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关键和关键在于治权,制度建设作为长远之策和根本之策,是管党治党和定国安邦的根本。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是务实举措,因为我们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别的什么,而是腐败;我们党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反腐败。

蕴含马克思主义政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始终坚持不脱离实践、与实践相结合,在回答时代课题中逐步创新发展,具有永恒价值意义。三个“更加”作为新时代我们党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运用科学方法论进一步深化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自觉性、坚定性、永恒性。牢固树立系统观念、全局观念,注重运用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全面从严治党科学方法论。

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要求从整体出发,注重分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全面从严治党不是简单的工作,而是一系列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些要素之间不是孤立存在,而是普遍联系;不是简单相加,而是相互促进,要进行整体性、关联性和结构性分析,正确认识处理重大关系。全局观念是一种观大势、谋全局、重整体、管长远的思想和工作方法,强调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 and 落脚点都是全局。全面从严治党要着眼大局、放眼长远,从局部看整体,从当下看长远,立足全局思考问题、评判得失,将全面从严治党全景图变为施工图。战略思维是谋划根本性、战略性问题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要求根据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设定战略目标,在此基础上作出实现目标的战略部署。全面从严治党,同样要从战略上思考部署,强化原则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加强前瞻思考、全局谋划、整体推进。辩证思维体现的是运用矛盾分析法认识事物,应对挑战的思想和工作方法,突出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实践证明,全面从严治党越向纵深发展,就越需要强化辩证思维,精准处理好变与不变、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既全面把握,又突出重点。

彰显全面从严治党的信心、恒心和决心

三个“更加”的重要要求,彰显我们党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强决心,说明我们党的事业推进到哪里、全面从严治党就跟进到哪里的坚定意志,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行动指南和重要指引,是对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和殷切期望。全面从严治党既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任务,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定必胜信心、如磐恒心和坚强决心。

这样的信心、恒心和决心,来自取得的重大成就。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这一重大命题,坚持管党治党务必从严,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机制更加牢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就。这样的信心、恒心和决心,来自科学的理论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带领人民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注入了丰富的理论滋养。这样的信心、恒心和决心,来自完善的制度保障。新时代,我们党着眼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党内法规,深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逐步构建监督体系,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自我监督制度不断完善,探索出了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这样的信心、恒心和决心,来自鲜活的实践基础。在全面从严治党伟大而鲜活的实践中,由于我们坚持对腐败零容忍,坚持作风建规抓常抓细抓长,形成了好的经验和做法,加之广泛运用信息技术,极大提高了应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题隐形变异的能力水平,为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引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十五五”时期,我们既要把已经形成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 and 有效做法总结好、贯彻好、运用好,又要根据当前我们面临的新形势、新环境、新任务,进行顶层设计、宏观决策,广泛实践,以从高标准、从严导向、从氛围管党治党,在全社会营造崇廉拒腐、清正廉洁的良好风尚,为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和推进反腐败斗争奠定坚实的基础。

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要更加坚决有力。这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要深化政治监督,重点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领域和重点任务,推进监督检查具体化、精准化和常态化;要探索有效方法途径,做到结合实际、因地制宜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促进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见到效果。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要更加科学有效。这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建立制度体系、健全制度规定、完善监督机制,使制度密而不繁、有效管用,让监督有力有序、发挥效能;既要防止牛栏关猫,又要警惕纸老虎禁虎,在全体党员中进行法规制度宣传教育,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力和实际执行力,让制度长牙带刺,发挥制度威力和作用。

推进反腐败斗争要更加清醒坚定。这是顺利实现既定宏伟目标的必然要求。腐败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的拦路虎和绊脚石。要把反腐败出现的新动向新特点,坚持创新手段,强化责任,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除恶务尽,提高反腐败穿透力;要强化系统观念,保持高压态势,加强联动配合,及时发现、准确识别、有效治理出现的一系列腐败问题,一体统筹推进“三不腐”。(执笔:周晓军)



2025年7月,西夏陵成为中国第60项世界遗产。

本报记者 王晓龙 摄

建言献策

以文旅融合促交往交流交融

□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课题组

自治区党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把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加快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强调深入实施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计划。加强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强化文化赋能,充分释放文旅产业在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中的窗口效应,有序推进各民族人口跨区域流动,是助力宁夏努力创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应有之义。

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引领作用。要加强顶层设计,在宁夏“十五五”文旅产业发展规划中,应始终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于全区文旅重点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文旅融合沿着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方向稳步推进。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收集整理宁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料和民间故事,创建宁夏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料资源库。在旅游景区、文化场馆、演艺场所等区域,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民族团结要素融入讲解词、沉浸式剧目、文艺作品、多媒体展示内容,生动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要构建多维宣传展示平台。拓宽宁夏文旅“朋友圈”,加强与沿黄省

区、西北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关联地区的接洽合作,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宣传互荐的“一盘棋”文旅工作新格局。加快宁夏智慧文旅服务平台的提质扩容升级,将宁夏“铸牢+文旅”品牌融入线上线下一体化宣传推介矩阵,综合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为游客精准定制旅游线路,提供优质文旅产品和服务。

加快推动“铸牢+文旅”融合工程全面升级。一是完善“铸牢+文旅”融合发展规划布局。深入挖掘宁夏各地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对全区自然景观、历史文化遗迹、民俗风情、特色村寨、文化地标等文旅资源进行普查与评估,明确各类资源的分布、特色与价值,完成全区文旅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功能分区,推动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的“铸牢+文旅”品牌布局。例如,永宁县积极响应全国大市场要求,用好《山海情》文化IP,启动建设“看见闽宁沉浸式演艺小镇”,通过深度还原原剧场景,凸显各族群众在宁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历程。二是持续丰富“铸牢+文旅”精品旅游线路。在全区范围内优选富有历史文化底蕴的自然景观、文化遗产、特色街区、文化场馆、传统村落、红色研学基

地等作为“铸牢+文旅”示范点,根据不同需求,组合形成主题明确、特色鲜明、规划合理的精品线路。如联动宁夏博物馆、水洞沟、贺兰山岩画、西夏陵、长城遗址、灌溉遗址等,可形成“中华民族探源之旅塞上行”精品线路。三是创新“铸牢+文旅”活动载体。择期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融合主题活动,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民俗体验、主题展览、体育赛事等,让各族群众在互动交流互动中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例如,西夏陵世界遗产研学游、金凤镇乡村大集、吴忠市特色饮食文化节等活动的成功举办,充分激发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巨大潜能。

以文旅融合持续拓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路径。要提升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和服务质量水平,优化各族游客交往的地域空间。进一步优化交通运输路网,协调增设来宁铁路和航空班次,加密沿线路网和公共交通线路,提高通达性与便捷性;结合各大旅游景区主题,润物细无声地嵌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元素,持续提升各族群众情感相通;新建或改建一批游客服务中心、停车场、休息区等配套设施,营造良好的“吃住游购”一体化体验环境。要提高优秀文旅产品产出效率,搭建各族游客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注重发挥文旅产业“以文化人”的教育转化作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人心,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创编各族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促进各民族间的了解与认同。要大力发展文旅新业态,助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和旅游协同发展等多维需求催生了“文博热”“乡村游”“红色研学”等特色文旅产业,极大程度促进了传统旅游经济与消费经济、服务经济等多种新型旅游类型的快速发展。宁夏须抢抓机遇,以文旅产业的巨大市场潜力赋能特色产品的加工、制作、销售等全产业链,为宁夏各族群众就业创业提供机遇和市场。推动实施各族群众共富计划,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民族手工艺、特色农产品加工、非遗手工作坊等特色产业,鼓励支持各族群众开办农家乐、民宿、特色手工艺品店等,参与旅游商品生产销售、民俗文化表演等旅游经营活动,拓宽当地群众增收渠道,带动更多群众享受文旅产业的发展红利,夯实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经济基础。(执笔:刘晓博)